

## 明代九边粮价与月粮折价关系的再考释

宋上上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近来研究指出,边镇月粮常折价与粮米常价一致,月粮临时调整折价则反映了极端粮价,打破了学界关于明代边镇粮价高昂的认识。但随着北边军事形势的变化,九边粮价与月粮折价的关系存在变动。根据边镇督抚奏议,九边承平时期粮米常价与军士月粮常折价基本一致,当边镇整体军事压力增大,粮米常价上涨到1钱/市斗以上,导致月粮折价低于粮米常价。局部灾荒、虏患时期,边镇会临时提高月粮折价,但仍低于粮米时估,这是由于边镇月粮折价存在有减无增的上限原则。时间上,明代中后期九边粮价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空间上,北方军事威胁从西向东转移,边镇月粮折价与粮米常价比值亦随之降低。最终,边镇根据粮价调整月粮发放的本、折比例,节省边储。

**【关键词】**边镇粮饷;粮价;月粮折价;仓斛市斗;督抚奏议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2-0082-14

## Re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in Price and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in the Nine Edges during Ming Dynasty

SONG Shang-shang

(School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pointed out that the regular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in the Nine Edge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normal grain price, and the temporary adjustment of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reflected the extreme grain price in the period of famine and war, break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high grain price in the Nine Edges during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 price and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in the Nine Edges has changed, and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Based on memorial to the throne of Supreme Commanders and Grand Coordina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measuring units of grain Dou for granary and Dou for market. In the purchase and accounting of grain, the Nine Edges took Dou for market as the unit, and sergeant monthly rations discount took Dou for granary as the unit. During the peacetime, the regular grain price wa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regular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When the military pressure in the border increased, the grain price generally increased to 1 Qian/Dou, leading to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below grain pr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famine and war, the Nine Edges would temporarily increase the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 but it was still lower than the grain price. This is due to the upper limit principle of monthly rations in the Nine Edges. On the whole, the grain price in the Nine Edges shows a slow upward trend. From west to east, the grain price gradually exceeds 1 Qian/Dou, and the ratio of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rations/grain price” gradually decreases, reflecting the process of ethnic migration and military threat transfer in the north.

**Key words:** Soldiers' pay and provisions of the Nine Edges; grain price; converted price of monthly

[收稿日期] 2022-04-20

[作者简介] 宋上上(1996-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代经济史。

rations; Dou for Granary and Dou for Market; memorial to the throne of Supreme Commanders and Grand Coordinators

## 引言

边镇粮饷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sup>①</sup>。对于边镇军士而言,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粮食供应。无论是民运、屯田,还是本色、折色,这些粮饷发放到边镇军士手里,最终都是用于贸易和消费,因此学界公认边镇存在着庞大的粮食市场。其中最值得关心的因素便是粮食价格。寺田隆信、全汉昇详细梳理统计了《明实录》《明经世文编》中不同时期九边粮价的数据,并据此绘制了明代九边米价指数图,认为北边米价自明中叶开始,存在长期上涨的趋势<sup>②</sup>。二位学者的研究非常翔实,为后世研究者广泛接受和引用。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一文(以下简称“胡文”)则敏锐地指出寺田氏和全氏研究的缺陷所在,即文中引用90%以上的数据都是灾荒、虏患等非正常年份的奇高粮价,并不能反映明代边镇粮食常价。胡文另辟蹊径,将边镇军士月粮折价和粮米价格联系起来,核心结论有两点,一是月粮常折价反映了九边粮米的常价或平价,二是月粮临时调整折价反映了边镇灾荒、虏患特殊时期的粮价。在材料的使用和辨析上,胡文认为边镇督抚出于请饷之需,在奏议中故意夸大边镇粮价,并不可靠,转而从地方志中统计边镇粮价数据<sup>③</sup>。胡文引证丰富,结论新颖,以月粮折价为线索,为边镇粮价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关于九边粮价和月粮折价关系,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张金奎认为户部故意压低月粮折银的时估,以节省开支,也就是说月粮折价低于边镇粮价。张金奎首先注意到,边镇月粮折银设有上限<sup>④</sup>。虽然张文并非专门针对边镇卫所而言,但其观点可以得到边镇史料的支撑。如正德九年(1514)户部尚书王琼云:“及查得甘肃官军月粮旧规,每年七月至十二月该支折色,除折布外,折银每石不过七钱,奉有前例,查照时估,随宜放支,有减无增。”<sup>⑤</sup>也就是说,甘肃月粮折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当粮价低于0.7两/石时,按照时估折银,即月粮折价=粮价;当粮价高于0.7两/石时,月粮每石最多也只能按照0.7两发放,即月粮折价<粮价。这一“旧规”在嘉靖初再次被强调,嘉靖九年(1530)户部尚书梁材云:“折放月粮,务照时估折放,如米价仍前高贵,止许每石折银七钱放支,不许似前加倍折放,亏损原数。”<sup>⑥</sup>因此胡文中提出“边镇月粮按时价折银”的原则,只是边镇月粮折银的其中一种情况。隆庆四年(1570)蓟镇总兵戚继光提议将军士月粮,按照招商时估减去一钱,折银发放,部议以“可以作弊”<sup>⑦</sup>为由否决,户部反对的根本原因正是月粮折银有减无增的上限原则。

① 赖建诚、范传南、王尊旺、万明、黄阿明等学者分别就屯田、民运、开中、京运等方面,针对明代边饷来源、数量作出了细致分析。详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范传南:《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2016年。

②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稻香出版社,1991年,第653-691页;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第三章《北部边塞的粮食市场与商业利润》,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4-152页。

③ 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

④ 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二章《卫所军士的粮饷》,线装书局,2007年,第135-137页。

⑤ [明]王琼著,张志江点校:《户部奏议》卷下《为甘肃官军月粮春夏该关本色亦与折银事》,《山右丛书·二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⑥ [明]梁材:《梁端肃公奏议》卷5《议处陕西四镇边储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42a页。所谓《嘉靖事例》就是将《梁端肃公奏议》的部覆部分节抄汇总。

⑦ [明]戚继光著,张德信校释:《戚少保奏议》卷4《覆政府议军粮改折》,中华书局,2001年,第138页。

胡文的表1征引了大量各边镇非灾荒年份的粮价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边镇月粮折价等于平常年份粮价的结论。但是仔细考察史料来源,却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时间选择上,表1中统计各地的粮价多是“大稔”“大熟”“大有年”等特殊时期的极低粮价。这些粮价往往是记载在地方志的《灾祥志》中,和灾荒相对,都是数十年难得一见,因此才会被记载下来,这些数据并不能反映边镇正常年份的常平粮价。同样道理,胡文中引用万历初年蓟镇米价0.35两/石,也是“蓟、辽连岁丰稔”<sup>①</sup>下的特殊情况。

第二,地点选择上,表1统计多是腹里地区而非边方城堡粮价。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北直隶粮价每石四钱,出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徐阶《请处宣大兵饷》,除了时间不合外,原疏是泛指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而言,不足以准确反映九边粮价,并且徐阶原文已经指出:“(宣、大)二镇米麦,每石值银三两以上。”<sup>②</sup>又比如隆庆年间山阳县粮价,实际上是记载史朝宜在“南畿剧邑”<sup>③</sup>当知县时的情况,因此地点是南直隶淮安府山阳县,并非陕西山阳县,自然与九边无关。

综上所述,月粮折价是否能够真实反映边镇粮价?仍有存疑。解决这一疑问仍需要回归到边镇粮食市场的核心问题上:各个边镇的粮价究竟是多少?这也是本文研究要推进的地方。本文讨论的粮价、米价指的主要是粟米,至于料豆、草束等其他物料,价格各异,暂不纳入考察范围。材料使用上,边镇督抚每年年终要向户部奏缴钱粮收支会计文簿,由于最终以银两作为边镇粮饷统计口径,督抚需要按照常年时估将粮料、草束折银换算。为了保证中央、边镇所掌握的粮草时估数据一致,兵部尚书胡世宁题准,自嘉靖八年为始,“各边管粮部官,责其月报米价贵贱,岁报田收厚薄。”<sup>④</sup>因此无论是督抚,还是户部,都掌握有一套米价数据,倘若边镇督抚在钱粮核算时虚报粮价,势必会被户部驳回。因此边镇督抚奏议中仍有大量常平米价的记载,可信度较高。随着明代嘉靖之后出版业的兴盛,督抚的题奏本章往往刊刻出版,基本保留了公文原貌。在明代内府档案大量逸失的情况下,奏议可以视为研究边镇粮饷较为原始的材料。本文引用明代九边督抚奏议近三十种,其中多为海内外馆藏孤本,希望能为明代边镇粮价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和认识。

## 一、边镇粮米度量衡:仓斛市斗

边镇粮价一般用“两/石”表示,涉及粮食的称重。问题在于明代存在仓斛、市斗的区别,度量衡并不统一。胡文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指出1市斗等于1.67仓斗<sup>⑤</sup>。由此提醒本文,史料中见到关于粮价、时估的记载,究竟是以市斗还是仓斗为单位?明人在边镇钱粮核算中也常注意到这一点,正如户部尚书毕自严指出:“市斗大而斛斗小,如前所云,恐未免以市斗之价而概论于斛斗也。”<sup>⑥</sup>因此清理九边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强调“务要反复酌量市斗、仓斗,较若画一”<sup>⑦</sup>,即要将粮价中的市斗和仓斗进行单位换算。那么市

①《明神宗实录》卷34,万历三年正月庚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792页。

②[明]徐阶:《世经堂集》卷2《请处宣大兵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375页。

③[明]何乔远编,厦门大学古籍所整理:崇祯《闽书》卷86《英旧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0页。

④[明]胡世宁:《少保胡端敏公奏议》卷10《尽沥余忠以求采纳疏》,影印明嘉靖刻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第563页。

⑤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

⑥[明]毕自严:《饷抚疏草》卷5《粮价腾涌召买艰难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5册,影印明天启刻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⑦[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3《清理蓟镇屯田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影印明万历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185页。



斗和仓斗究竟有多少斤重?在粮价统计中应该以什么单位为标准?

由于明人缺乏严谨的体积、质量概念界定,容积单位“斛”和重量单位“石”常通用换算。明朝官府对于仓斛的大小做出了严格规定,明末精通律吕的张介宾记载:“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斛法……根据宝源局尺量……得一千四百七十寸,为铁斛五斗实积。倍之得二千九百四十寸,是两铁斛即十斗实积。”<sup>①</sup>即1仓斛的容积约为1.5立方尺,折合5仓斗。根据一石二斛,一石粮米的体积约为3立方尺,这种体积和重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就是所谓的“斛法”。明制一石重120斤(每斤600克),因此一仓斛粮米重60斤,一仓斗粮米重12斤,容量固定。

市斗的大小并不固定。以大同镇为例,嘉靖三十三年(1554),宣大总督王忬指出军士月粮“较之市斛,每石止得七斗”<sup>②</sup>。嘉靖四十年(1561),户部尚书高耀复大同巡抚杨选云:“及查该镇月粮时估,率以市斗定拨,市斗七斗二升即足仓斛一石。今闻市斗更大,每六斗七升即足仓斛一石。”<sup>③</sup>隆庆五年(1571),宣大总督王崇古云:“即今山、大……边方斗大,每市斗六斗三升即充官斛一石。”<sup>④</sup>万历二十九年(1601),宣大总督杨时宁云:“况本镇巢卖,斗米值银三钱,盖指市斗而言。若漕粮一石,止抵市斗六斗,运至大同。”<sup>⑤</sup>崇祯元年(1628),户部尚书毕自严云:“查得漕运仓斛,较之大同市斗,每米一石止有五斗四升。”<sup>⑥</sup>由此可见,市斗存在着不断增大的趋势,从嘉靖至崇祯,大同镇仓斗和市斗的比例分别是:0.72:1→0.67:1→0.63:1→0.6:1→0.54:1。其他边镇如辽东天启时,“辽斗大,每斗可二十斤”<sup>⑦</sup>,与大同情况类似。为了便于计算,本文将市斗大小折中,嘉靖时采用0.7:1,即每市斗17.14斤;隆庆、万历、天启采用0.6:1,即每市斗20斤整;崇祯采用0.5:1,即每市斗24斤。

这种粮米收支大、小斗的情况,宋代就已经出现,郭正忠统计了宋代的加斗与加斛,指出增加比例在10%~90%之间<sup>⑧</sup>。边镇度量衡的混乱可能与税粮征收中大斗进、小斗出有关。正德末延绥巡抚姚镆禁革边储积弊,其中就包括“仓官、攒斗人等,于收粮之时……不将原降官斛斗秤收受粮料草束,用私造斛斗秤,措害客商大户。”<sup>⑨</sup>嘉靖二十七年(1548),户部申令:“宣府一镇往时收用市斛,放用仓斛,合行查革,以后收入、放出俱以仓斛为准。”<sup>⑩</sup>自然是有禁无止。这反映出,边镇收买粮米,是以市斗为单位;边镇向军士方支粮米,则是以仓斗为单位。山西巡抚吕坤云:“市斗大于仓斛,凡发银籴谷,市斗作价,官斛报数。”<sup>⑪</sup>

① [明]张介宾:《类经附翼》卷2《我朝斛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第427页。

② [明]王忬:《御史大夫思质王公奏议》卷9《条处兵马钱粮恳乞天恩大破常格速赐施行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1册,影印明隆庆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807页。

③ [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24《大同镇饷额》,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一册,第587页。按《万历会计录》原作“巡抚杨博”。按杨博时任兵部尚书,查《明督抚年表》可知嘉靖四十年大同巡抚应为杨选。

④ [明]王崇古著,张志江点校:《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7《为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事》,《山右丛书·三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28页。

⑤ [明]杨时宁:《总督宣大山西军门奏议》卷1《题为穷边困极再恳天恩减米价缓扣抵酌往例以救时艰以恤重镇事》,《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3册,影印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1页。文中提及预派万历三十年年例银,因此可知奏疏上于万历二十九年。

⑥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山西司》卷1《题覆大同抚臣张宗衡议减临德米价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0册,影印明崇祯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5页。

⑦ [明]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85《与周浒西户垣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影印明崇祯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⑧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⑨ [明]姚镆:《东泉文集》卷8《巡抚事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6册,影印明嘉靖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第733页。

⑩ 万历《大明会典》卷37《户部·课程·权量》,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刊本,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698页。

⑪ [明]吕坤著,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实政录》卷2《积贮仓谷》,中华书局,2008年,第951页。

正如胡文指出,市斗和仓斗的差价,最终用于支付商人的运输成本和利润<sup>①</sup>。万历二十九年,宣大总督杨时宁就大同镇钱粮核算中,如何权衡仓斛、市斗差异,做出了说明:

大同斗米三钱……上半年约用仓斛粮一十九万二千余石,然以折例,每斗止该银七分,以市估则折米六升,该银一钱八分,是一斗而折二斗五六升之价,较用本色,共多费银二十余万。<sup>②</sup>

杨时宁指出,军士月粮如果按照时估发放银两,比月粮折价要多花费二十余万两。具体来说,大同镇军士月粮折价则例是每仓斗0.7钱,如果按照时估发放银两,军士月粮1仓斗折合0.6市斗,时估为3钱/市斗,也就是说每名军士需要支银 $0.6 \times 3 = 1.8$ 钱,是月粮折价的2.57倍。上半年共计多支出 $19.2 \times (1.8 - 0.7) = 21.12$ 万两。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边镇军士月粮折价是以仓斗为单位,而督抚在进行钱粮收支核算时,则是按照市斗为单位<sup>③</sup>。为了表示这种差别,本文在统计粮价时皆采用“钱/市斗”或“钱/仓斗”为单位,由于“两、钱”及“石、斗”之间都是十进制,因此“钱/斗”和学界通用的“两/石”本质上是一样的。

## 二、九边粮米常价与月粮常折价

明代九边作为统称,延袤万里,按照时间先后又可具体划分为六镇、九镇、十三镇等。鉴于史料和篇幅所限,本文分别选择延绥镇、大同镇、蓟州和辽东镇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代表了九边里西边、中部、东边的情况。明代九边的修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北边军事威胁,这种边防压力指的是边镇整体上的防御形势,而非个别墩堡的局部的虏患,并随着蒙古人的迁徙而演变。边防压力增大直接导致边防经费的陡升,尤其是京运年例银的提高,而这些钱粮一经增加,往往固定下来,成为边镇粮饷的经制,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边镇的钱粮收支和市场贸易。因此在考察边镇粮价和月粮折价时,需要注意到各个边镇边防压力的不同和演变。

### (一)延绥

自明中期以来,鞑靼进入河套地区,即所谓“套虏”,导致陕西军事压力增大,因此成化九年(1473),延绥巡抚余子俊将镇治迁徙至榆林堡,增修边堡<sup>④</sup>。明廷亦在成化、弘治年间增设三边总制弹压<sup>⑤</sup>。关于这一时期的边镇粮价和月粮折价,成化七年(1471),延绥巡抚余子俊记载:

据延安、绥德、庆阳三卫旗军陈真等状告:各在榆林东、西二路常川守备……其月粮一石,在于原卫关支,因为穹远,不能摘离前去,只得贱卖,每石得银一钱二三分。近该延绥巡抚官见得旗军艰难,养赡不过,逃者将半,无法存恤,具奏将布政司送来户部官银,每石照依本部原征

① 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

② [明]杨时宁:《总督宣大山西军门奏议》卷1《题为穷边困极 再恳天恩减米价缓扣抵酌往例以救时艰以恤重镇事》,《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3册,第31-32页。

③ 边镇亦利用仓斗、市斗的差价牟利,如三边总制王崇古记载延绥镇:“至正德初年,先任文布政查照该年时估,将各处民运每米、豆一石并脚价,米折征银一两二钱,豆折征银一两,俱解广有库,折放官军俸月粮料之用……该镇折放军粮,每月支粮银五六钱、料银六钱。”([明]王崇古著,张志江点校:《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11《为恪遵圣谕条陈边务以图安攘事》,《山右丛书·三编》第4册,第466-467页)即州县地方起运边镇的粮米按照市斗时估,连脚价折银征收,而军士月粮发放则是按照仓斗。

④ [明]许论:《九边图论·榆林》云:“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议徙镇榆林堡。”(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七年刻本,第11a-b页)

⑤ 侯颖:《明代陕西“三边总制”制度研究》指出,成化十年初设三边总制,弘治十年复设。(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68-71页)

则例,折银二钱五分,虽于时价有亏,但得即时应急,比之贱卖,尽是乐从。

缘原卫仓粮,每年征收时月,每石直银五钱、六钱,沿边仓粮每石直银八钱、九钱。<sup>①</sup>

余子俊所云“每年”,代表了常平粮价,而“仓粮每石直银”,则当以仓斗衡量。此时延绥镇治尚在绥德,镇城粮价为0.5钱/仓斗~0.6钱/仓斗,三边总制唐龙追溯弘治十四年(1501)之前延绥粮价云,“每银一两可余二三石”<sup>②</sup>,基本与之相符,可见绥德粮米常价在0.5钱/仓斗左右。榆林边堡粮价则高达0.8钱/仓斗~0.9钱/仓斗,而同时期旗军月粮折价只有2.5钱,大约是绥德粮价的一半,只能买到榆林堡0.3仓斗左右的粮米。尽管如此,仍要比旗军将原卫支领月粮贱卖一钱二三分划算,因此每石2.5钱的月粮折价得到了官军的一致认可。明人往往将延绥镇粮价的上涨归结为弘治以后民运粮米改为折银征解,如宣大总督许论《九边图论》所云:“弘治中,布政文贵奏改西、延、庆三府本镇之税为抛荒折色者二万余石。正德中,侍郎冯清又改三府本色尽为折色,自是军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谣。”<sup>③</sup>事实上,根据余子俊奏议可以看到,成化时延绥镇粮米常价已经上涨。

至嘉靖时,三边总制唐龙(嘉靖十一至十四年任,1532-1535)疏云:

榆林地方节遭凶荒,公私俱匮。官军月粮给本色三斗,折色七斗,折银四钱九分,以今时值买米二斗九升四合。

自弘治十四年大虏占套,民废耕种。粟米、草料等项,俱仰给腹里搬运。银一钱,遇熟余米八九升;不熟,仅余五六升。熟时实少,不熟时实多。<sup>④</sup>

根据第一段材料可知嘉靖初延绥镇军士月粮折价为 $4.9/7=0.7$ 钱/仓斗,考虑到粮米收买和放支斛斗的不同,延绥镇粮米时价应为 $4.9/2.94=1.67$ 钱/市斗。但需要注意这是“节遭凶荒”的情况,并非粮米平价,这一价格与第二段材料中“不熟”时期“一钱余米六升”的粮价相一致,也就是第二段材料中提到的粮价就是嘉靖时粮价,并非弘治十四年。因此嘉靖“遇熟”时期粮米平价为1.11钱/市斗~1.25钱/市斗,折合0.78钱/仓斗~0.88钱/仓斗,军士月粮常折价大约可以买到0.8仓斗~0.9仓斗的粮米。嘉靖十八年(1539),陕西河西分守道陈儒云:“至榆林召商,每银一钱则或止买七八升,或买一斗……至折放官军月粮,每石例该折银七钱。”<sup>⑤</sup>由此可知延绥镇城米价1钱/市斗~1.43钱/市斗,折合0.7钱/仓斗~1钱/仓斗,这与唐龙提及的粮价基本一致,应属于常价。军士月粮常折价大约可以买到0.7仓斗~1仓斗的粮米。

隆庆二年(1568),三边总制王崇古云:

榆林镇城,四望沙漠,绝无耕收积贮。每岁招商银易,费价十数万。邻境丰收,每银一钱余米八九升,一遇虏患、荒歉,每钱止余米五六升,故该镇有米珠薪桂之谣……该镇折放军粮,每月支粮银五六钱、料银六钱,遇米、豆贵时,止可得米四五斗、料六七斗,人马不足半月之用,军士困急。<sup>⑥</sup>

由于是“招商银易”,粮价当以市斗衡量。隆庆初延绥镇城的粮米常价基本上与嘉靖初一致,都是1.11

① [明]余子俊:《余肃敏公奏议》卷1《优贍边军三》,《明人奏议十七种》第2册,影印湖南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年李充嗣刻六卷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1年,第25-27页。

② [明]万表辑,于景祥、郭醒点校:《皇明经济文录》卷38《大虏住套乞请处补正数粮草以济紧急支用疏》,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783页。

③ [明]许论:《九边图论·榆林》,第11b-12a页。

④ [明]万表辑,于景祥、郭醒点校:《皇明经济文录》卷38《大虏住套乞请处补正数粮草以济紧急支用疏》,第781-783页。

⑤ [明]陈儒:《芹山集》卷25《边方事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影印明嘉靖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⑥ [明]王崇古著,张志江点校:《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11《为恪遵圣谕条陈边务以图安攘事》,《山右丛书·三编》第4册,第467页。



钱/市斗~1.25钱/市斗,折合0.67钱/仓斗~0.75钱/仓斗。在虏患、荒歉等特殊年份粮价上涨至1.667钱/市斗~2钱/市斗,折合1钱/仓斗~1.2钱/仓斗,涨幅约50%。而同时期军士月粮折价只有0.5钱/仓斗~0.6钱/仓斗,以最高0.6钱计,按照正常年份时估折算,可以买到0.8仓斗~0.9仓斗的粮米。倘若米贵之时,“止可得米四五”仓斗。又王崇古会计隆庆三年(1569)延绥镇钱粮岁入不足时提及“年岁丰凶不等,较中为常,以银一钱买米八升、买豆一斗三升为则”<sup>①</sup>,那么这里粮米的常价指的是仓斗还是市斗?“银一钱买米八升”折合1.25钱/斗,恰与隆庆二年(1568)延绥镇城1.25钱/市斗的价格一致。由此可见,边镇在会计钱粮时,是按照收买粮米的市斗价格进行计算。

万历二年(1574),三边总制石茂华会计延绥军马、钱粮实数云:

历查本镇米粮,自来腾贵,中外素知。每银一钱买米六七升、豆八九升者,岁常十六;银一钱买米八九升、豆一斗一二升,者岁仅十四;银一钱买米一斗、豆一斗四五升者,十数年中方得一遇。

今查阅视侍郎王题内时估,粮一斗、料一斗五升,计银一钱,乃以各镇大约而言,原非该镇较中可常之数,致蒙本部以此计论,故与本镇所计异同。兹欲视此为准,恐难为经常至计。今考以各路往年时估,无论岁入、岁出,俱酌以米九升、豆一斗二升、草伍束,各算银一钱,虽于时值较差,似可为经常之值也。<sup>②</sup>

延绥镇的粮价受时节影响,每银一钱买米六升至一斗不等,阅视陕西三边侍郎王遴在会计钱粮时按照最低1钱/市斗核算,低于延绥粮米常价,由此导致户部京运粮价银减少,边镇招商采买粮米不足量,因此石茂华提出要按照“较中可常之数”折算,即粮米常价1.11钱/市斗,折合0.67钱/仓斗。关于延绥镇的月粮折价,石茂华云:“每军月给本色米不过二斗,折色八斗,所折之银,除去朋合,所得多者不过五钱一分,少者四钱七分。所买米不及四斗,名曰月粮一石,实止五六斗之粟。”<sup>③</sup>按万历《延绥镇志》记载旗军桩朋银五分<sup>④</sup>,则每名旗军月支折银5.2钱~5.6钱,以八斗计,则月粮折价为0.65钱/仓斗~0.7钱/仓斗。虽然石茂华声称月粮止五六斗,但这主要是针对“每银一钱,买米六七升”米价高昂年份而言,就延绥镇粮米常价而言,基本上与旗军月粮常折价一致。万历十一年(1583)萧彦疏云:“曩阅定边,则去岁四月也,当其时,该镇(延绥)银一钱米七升有奇。”<sup>⑤</sup>萧彦记载的榆林镇粮价虽然高达1.43钱/市斗,但这是四月春季粮价涌贵的时候。根据陕西河西分守道陈儒所说:“秋收过期,乃始发银采买,计所入常减于秋成之一二”<sup>⑥</sup>来看,延绥镇秋冬粮价应当为 $1.43 \times 0.8 \approx 1.14$ 钱/市斗,这与万历二年的粮价基本一致,可以视作万历时延绥镇粮米常价。

## (二)大同

明代嘉靖年间俺答部落崛起,明代九边的主要军事威胁转移到宣府、大同、蓟州等中部边镇。尤其是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之后,大同镇首当其冲,军队和年例银数量逐年攀升,以大同镇为例可以反映明代中后期九边中部的粮价变化。

弘治七年(1494),山西巡抚张敷华疏云:“访大同等处常年召商,米麦用银不过五六钱,豆不过三四

① [明]王崇古:《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15《为套虏猖獗众强兵马寡弱重镇孤悬恳乞天恩俯赐增兵马广储积效愚忠以图战守事》,《山右丛书·三编》第4册,第662页。

② [明]石茂华:《毅庵总督陕西奏议》卷5《请明军马实数并乞天恩议处军饷以济急缺支用事》,影印明万历刻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中册,第31-33页。

③ [明]石茂华:《毅庵总督陕西奏议》卷5《请明军马实数并乞天恩议处军饷以济急缺支用事》,中册,第73页。

④ 万历《延绥镇志》卷3《马政》,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8页。

⑤ [明]孙旬:《万历疏钞》卷13《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影印明万历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2页。

⑥ [明]陈儒:《芹山集》卷25《边方事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6册,第209页。

钱,可余一石,草不过银二分、三分,可买一束,折与官军亦如此数,斟酌给散。”<sup>①</sup>可见弘治时大同镇月粮折价和粮米常价基本一致,都是0.5钱/斗~0.6钱/斗,张敷华疏中并没有提及仓斗和市斗的差异,或是由于弘治时大同镇仓斗、市斗大小差别尚不明显。

至嘉靖时,随着整体边防压力增大,大同粮价开始上涨。嘉靖九年(1530),户部议准将太仓年例银和盐引运送大同,收买粮料,“每银一两,务依原拟,采买二石有余,次之亦不失一石五斗之数”<sup>②</sup>。可见官方原本拟定的收购价格为0.5钱/市斗~0.67钱/市斗,基本上是依据弘治时期的时估。然而大同管粮郎中王民却呈称:“查得大同内外城堡,每月报到时估,价值渐增,不敷原拟银两斗头数目。”<sup>③</sup>所谓“斗头”,指的就是粮价<sup>④</sup>。嘉靖十年(1531),直隶巡按李宗枢言:“以今宣、大两镇论之……(月粮)折色之价,少则六钱,多则六钱五分……以寻常市价斗米银钱计之,多者仅能易米六斗五升,是三分而失其一也,况平岁多凶歉,价每沸腾。”<sup>⑤</sup>可见大同镇的实际粮米平价已经上涨到了1钱/市斗,原拟的斗头斤重自然不敷。嘉靖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潘潢在会计大同镇防秋军饷时指出:“照今岁时估,每银一两买米九斗。”<sup>⑥</sup>嘉靖三十七年(1558),阁臣严嵩云:“臣等近据大同人说称,今岁该镇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sup>⑦</sup>可见“一两九斗”可以视作嘉靖中期大同镇的粮米常价,即1.11钱/市斗,折合0.78钱/仓斗。若是青黄不接之时,米价则上涨至1.67钱/市斗以上<sup>⑧</sup>。关于大同镇军士月粮的发放则例,嘉靖三十三年宣大总督王忬云:“上半年月给本色米三斗,余给折色,下半年全给折色。折色在边地月给银七钱,在腹里月给银六钱。”<sup>⑨</sup>《万历会计录》中大同镇主兵月粮则例亦记载:“下半年全支折色,俱照例每石沿边七钱,腹里六钱。”<sup>⑩</sup>那么大同镇城是算作边方还是腹里?按宣大总督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破虏堡》云:“本堡旧称极冲,自添建五堡,边墙外徙,始称腹里。”<sup>⑪</sup>而位于破虏堡南侧的大同镇城自然可称为腹里。故大同镇城的月粮折价为0.6钱/仓斗,每月可以买到0.77仓斗的粮米。

隆庆五年(1571),宣大总督王崇古疏云:

今幸北虏纳款,边烽暂熄……臣复查得,今岁冬初大同各城堡在边者米斗一钱,荞、豆将及二斗,腹里者每银一两买米六七斗,较之仓斛,已将一石,此数十年所无,军民稍苏。<sup>⑫</sup>

其中边堡的粮价反而低于腹里,尚有存疑。可以确定的是腹里大同镇城的粮价为1.43钱/市斗~1.67钱/

① [明]张敷华:《张简肃公奏议》卷1《题为处置边粮以苏民困事》,《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8册,影印明抄本,线装书局,2010年,第273页。

② [明]梁材:《梁端肃公奏议》卷7《查考大同预支粮银疏》,第70b页。

③ 同上。

④ 乾隆《合水县志》卷下云:“粮价曰斗头。”(《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9册,影印清乾隆刻本,中国书店,1992年,第613页)乾隆《同官县志》卷四亦云:“粮价曰斗头。”(《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40号,影印清乾隆三十年抄本,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95页)需要注意的是与今天通常统计粮价的单位不同,斗头的单位是斗/钱,因此官府在召买粮料时量减斗头,实际上则是提高粮料的收购价格。

⑤ [明]李宗枢:《李石叠集》卷4《陈言边务疏》,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刻本,第19a-20b页。

⑥ [明]潘潢:《朴溪先生奏疏》卷6《议覆大同抚臣请给边饷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11a页。

⑦ [明]严嵩:《嘉靖奏对录》卷12《请乞差官于宣大二镇预买米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19册,影印明嘉靖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30页。

⑧ 嘉靖二十五年,宣大总督翁万达云:“又该臣巡历诸边,亲见各该城堡仓场粮料草束缺乏太多,地方物价腾贵,官发百金,易米计不能六十石,召商且弗至也。”([明]翁万达著作,朱仲玉、吴奎信点校:《翁万达集》卷13《会计钱粮以御患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8页)

⑨ [明]王忬:《御史大夫思质王公奏议》卷9《条处兵马钱粮恳乞天恩大破常格速赐施行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1册,第807页。

⑩ [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24《大同镇饷额》,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一册,第590页。

⑪ [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大同镇图说·破虏堡》,《玄览堂丛书》第2册,影印明万历刻本,第1137页。

⑫ [明]王崇古著,张志江点校:《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6《为趁秋成采买隆庆六年粮草省价值以裕边储事》,《山右丛书·三编》第4册,第210页。



市斗,折合1钱/仓斗。根据“此数十年所无”来看,一方面说明大同镇的粮米常价还要更高,军士月粮折价0.6钱/仓斗,余买粮米当不足6斗。另一方面,大同米价的降低应与隆庆和议之后边防压力的减轻有关。

万历时大同镇的粮米价格,由于史料匮乏,暂不得知,可以将临近山西三关镇的粮价作为参考。万历十七年(1589),山西巡抚沈子木会计三关前一年收支云:“又近年召买,恒苦无银,不得及其秋收甫毕米价方贱之时,往往至次年二三月间,然后给发。维时边方已斗米二钱四五分,又一石二费二石之价矣。”<sup>①</sup>通过次年米价上涨了一倍可知,三关秋冬粮米价格应为1.2钱/市斗~1.25钱/市斗。又沈子木在会计岁出时提及“本色米豆五万六千五百石,每年召买凑放约用银七万余两”<sup>②</sup>,平均每年每石米豆时估约为1.25钱/市斗,可以视为三关粮米常价。由于三关“与大同相为表里”<sup>③</sup>,大同镇万历时的粮米价格或不低于1.25钱/市斗。

至崇祯十一年(1638),宣大总督卢象升疏云:

臣将崇祯八、九、十三年召买则例,合三镇二十二路一百八十三城堡,通盘查算历年时估,米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三斗四五升,以至五斗而止……今年雨泽应期,加以连年兴屯,地方安堵,穷边觉有起色,物价亦且渐平。就阳和近地言之,每银一两可买市斗米六斗上下。<sup>④</sup>

卢象升统计崇祯八到十年内,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粮米价格在2钱/市斗~2.9钱/市斗范围内,而十一年大同镇阳和卫的米价低平,仅为1.67钱/市斗,考虑到大同镇城物价稍高,姑算作2钱/市斗,折合1钱/仓斗。同时期宣、大二镇“戍卒有月支粮银八九钱者,甚而有六七钱者”<sup>⑤</sup>,若以最高9钱计,月粮折价可余买粮米0.9仓斗。

### (三) 蓟、辽

辽东自明初平定之后,直至万历末萨尔浒之战,基本上没有严重军事威胁,加上辽东耕地广阔,粮米常价一直低于其他边镇。嘉靖三十三年(1554),蓟辽总督杨博云:“辽东一带颇见收成,备询公使人役,咸谓计银一钱可得杂粮四斗五升。”<sup>⑥</sup>粮价为0.22钱/市斗,但这是杂粮的价格。嘉靖初阁臣桂萼指出:“今天下北地,但知买粟,南则稻米,不知二麦、诸豆,其直殊轻,诚兼收之,较诸粟米可得二倍。”<sup>⑦</sup>万历九年(1581),宁远前屯呈报仓储粮料亦云:“每米豆一石,折收藿谷二石。”<sup>⑧</sup>可见粟米的价格是杂粮的两倍,为0.44钱/市斗。万历十四年,蓟辽总督王一鹗疏云:

辽人得深耕沃土,而米谷贱,民间为市,米一石值银二钱五分,故官给军饷亦以银二钱五分抵一石……皇上御极以来,两俞抚臣之请,渐加月饷,已至四钱……又以战马无措,内除五分为朋银,是每军每月仅得三钱五分耳。

今以辽左粮刍计之,岁登米贱,一石价可四五钱,稍贵可六七钱。<sup>⑨</sup>

① [明]沈子木:《督抚三晋奏议》卷5《题为交代有期敬陈地方应议事宜以毕愚分事》,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刻本,第63a页。

② [明]沈子木:《督抚三晋奏议》卷5《题为交代有期敬陈地方应议事宜以毕愚分事》,第62a页。

③ [明]李攀龙著,包敬第点校:《沧溟先生集》卷19《新设宁武兵备道题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5页。

④ [明]卢象升著,方福仁辑校:《卢象升疏牍》卷11《请飭召买事宜以裕边计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99页。

⑤ [明]卢象升著,方福仁辑校:《卢象升疏牍》卷6《用人修具飭法治兵疏》,第123页。

⑥ [明]杨博著,张志江点校:《杨襄毅公蓟辽奏疏》不分卷《暂借官银召买民粟以济荒政疏》,《山右丛书·二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⑦ 《明世宗实录》卷115,嘉靖九年七月丁未,第2737页。

⑧ 辽宁省档案馆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128《宁远前屯塔山杏林等仓呈报贮存米豆盐等清册》,辽沈书社,1985年,第504页。

⑨ [明]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卷5《议增辽镇军饷马价疏》,《玄览堂丛书》第7册,影印明万历刻本,广陵书社,2010年,第4736-4740页。

辽东粮米价格为0.4钱/市斗~0.5钱/市斗,这与杨博的记载相符,可以视为嘉靖以来辽东粮米常价。与之匹配,月粮折价也增加到了0.4钱/仓斗,二者基本保持一致。当然如果扣除桩朋银,军士实际到手的银两并不足以籴买一石粮米。万历三十一年(1603),辽东巡按何尔健指出,监生唐尧勋私刻印信获利“价值银二万一千五百余两,该抵军饷米豆四万三千余石”<sup>①</sup>,可见辽东米豆均价为0.5钱/仓斗,粮价基本上与万历十四年一致,同时“沿边穷卒,月止粮银四钱”<sup>②</sup>,可籴买0.8仓斗粮米。

万历末自辽东事起、萨尔浒之战后,辽东粮价飞涨,斗米值银数钱的记载屡见不鲜,就粮米平价而言,崇祯四年(1631)户部尚书毕自严疏云:“查残辽初复,薪桂米珠,故召买之价,连脚价有三钱一斗者,有二钱五分一斗者,今年不致如是之贵。今年兵粮凑集,风两时调,故市上之价,除脚价有一钱一斗者,有一钱二三分一斗者。”<sup>③</sup>自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后,辽东战局进入相对缓和期,因此米价较为低平,在1钱/市斗~1.3钱/市斗之间。由于辽饷组成和发放复杂,以募兵饷银和客兵行粮为主,故主兵月粮折价暂略去不论。

明代前期蓟镇的边防压力较小,嘉靖二十九年始设总督<sup>④</sup>。至“穆宗之元,东虏孔棘”<sup>⑤</sup>,边防压力开始增大,于是有了戚继光率领浙兵移镇蓟州。根据王尊旺统计,在嘉靖末至万历初,蓟镇的京运年例银从10万两飙升至70万两<sup>⑥</sup>,这势必会导致蓟镇粮米常价的上涨。嘉靖四十三年(1564),蓟辽总督刘焘会计蓟镇客兵钱粮云:“往岁每米一石值银三钱五分,豆一石值银二钱三分。今春米价六钱五分,豆价五钱,较之往年,将加一倍。”<sup>⑦</sup>春季米价上涨姑且不计,刘焘提及往年米价0.35钱/斗,可以视作嘉靖时蓟镇粮米常价。这一时期月粮折放则例,蓟辽总督杨博云:“下半年支折色,每石在边四钱五分,在卫四钱。”<sup>⑧</sup>则镇城军士月粮折价为0.4钱/斗。可见嘉靖时蓟镇月粮折价和粮米常价基本一致。与辽东类似,蓟镇同样不考虑度量衡的差异,可能也是按照市斗发放月粮。

隆庆二年(1568),蓟辽总督刘应节疏云:

再照原额会计钱粮,节年以来,岁丰价平,每米一石,价不过四钱,豆每石价不过二钱五分,且地方安静,守援兵马无增,粮草足用。但隆庆元年九月内,大虏入寇……粮价渐腾,比之往岁加倍。<sup>⑨</sup>

刘应节提及往年米、豆常价,基本上与刘焘奏疏中记载的相同,也与蓟镇军士月粮折价一致。但是隆庆元年由于“大虏入寇”,导致蓟镇粮价提高了一倍,达到0.8钱/市斗左右。这一价格可以视作军事威胁下蓟镇粮米的常价。原因有两点,一是刘应节提及“密云召商买米,每石常至一两”<sup>⑩</sup>,密云的常价是1钱/市斗,蓟州的米价当与之接近。二是隆庆四年,蓟镇总兵戚继光对于户部制定的月粮折价则例不满,原因是:“以折价言之,春止六钱五分,秋止四钱五分,料豆止二钱五分,亦只得五斗之实,只以一石为名色耳。”<sup>⑪</sup>军士的月粮折价只能买到五斗的粮食,可见蓟镇秋季粮米平价应当在 $0.45 \times 2 = 0.9$ 钱/市斗左右,这与刘应节奏疏中记载的价格相符。可见隆庆年间蓟镇的粮米常价为0.8钱/市斗~0.9钱/市斗。

① [明]何尔健著,何全、郭良玉编校:《按辽御疏稿·镇城劫狱》,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52页。

② [明]何尔健著,何全、郭良玉编校:《按辽御疏稿·急停矿税》,第6页。

③ [明]毕自严:《度支奏议·山东司》卷4《题覆辽镇盐粮米价并办纳规制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87册,第720页。

④ 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19-220页。

⑤ [明]郭造卿撰,齐庆昌点注:《卢龙塞略》卷11《隆万经略》,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⑥ 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第三章《明代九边京运银数量考》,第171页。

⑦ [明]刘焘:《蓟辽奏议》卷4《会计客兵钱粮疏》,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第21b页。

⑧ [明]杨博著,张志江点校:《杨襄毅公经略疏稿》卷1《议处月粮以便下情省官运疏》,《山右丛书·二编》第4册,第63页。

⑨ [明]刘应节:《白川刘公督抚奏议》卷1《议处财用定经制以垂永久疏》,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20b-21a页。

⑩ [明]刘应节:《白川刘公督抚奏议》卷5《改河通漕以济边储疏》,第41a页。

⑪ [明]戚继光著,张德信校释:《戚少保奏议》卷4《覆政府议军粮改折》,第139页。

综上所述,将明代延绥、大同、蓟州、辽东四镇不同时期的粮米常价总结如下表所示:

表 1	明代九边粮米常价				单位:钱/市斗
时间	延绥	大同	蓟州	辽东	
成化七年(1471)	0.8~0.9				
成化十二年(1476)				0.25	
弘治七年(1494)		0.5~0.6			
嘉靖十年(1531)		1			
嘉靖十一年(1532)	1.11~1.25				
嘉靖十八年(1539)	1~1.43				
嘉靖二十九年(1550)		1.11			
嘉靖三十三年(1554)				0.44	
嘉靖三十七年(1558)		1.11			
嘉靖三十九年(1560)			0.35		
隆庆二年(1568)	1.11~1.25		0.8		
隆庆四年(1570)			0.9		
隆庆五年(1571)		1.43~1.67			
万历二年(1574)	1.11				
万历十年(1582)	1.14				
万历十四年(1586)				0.4~0.5	
万历十六年(1588)		>1.25			
万历三十年(1603)				0.5	
崇祯四年(1631)				1~1.3	
崇祯十年(1637)		2			

资料来源:《余肃敏公奏议》卷1,《张简肃公奏议》卷1,《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6、11,《朴溪先生奏疏》卷6,《白川刘公督府奏议》卷1,《毅庵总督陕西奏议》卷5,《督府三晋奏议》卷5,《总督四镇奏议》卷5,《卢象升疏牍》卷11。

月粮折价与九边粮米常价的比例关系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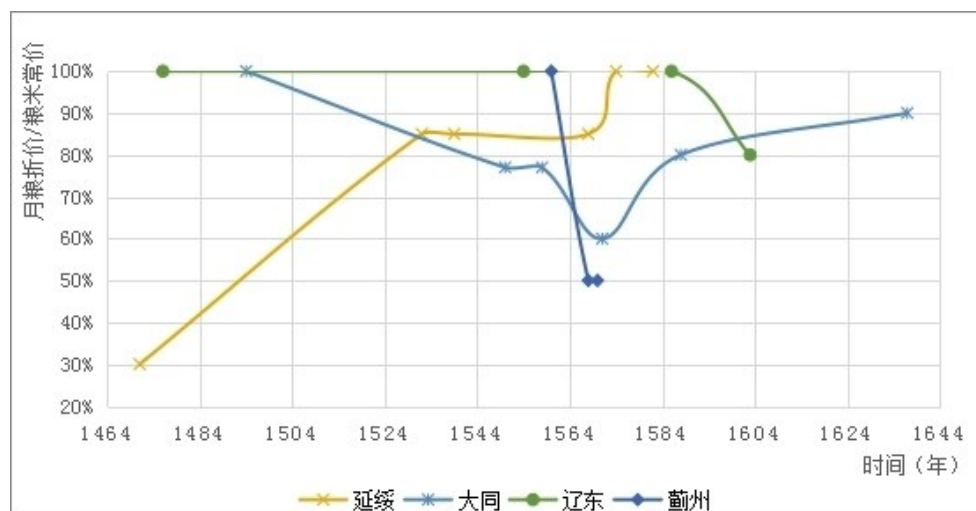


图1 明代月粮折价和粮米平价比例关系



### 三、九边灾患粮价与月粮调整

由于明代边镇地区气候苦寒,风雨不时,军士砍伐、烧荒对于生态环境破坏,导致边镇灾荒时有发生,再加上秋冬马肥河冻,北虏不时南下抢掠,边镇米价自然腾贵。军士月粮折价不敷食用所需,边镇督抚不得不根据粮米时估,对于月粮的发放作出调整。那么临时调整折价是否能够反映灾荒或虏患时期的粮价状况呢?

嘉靖九年(1530),兵部尚书李承勋复三边总制王琼疏云:

(延绥镇)每军月粮折支虽给价银七钱、八钱,余买不足。近于正、二月来,为因荒乱,将价增至一两一钱。查得时估每米一石价银三两、料豆一石价银二两,今给前价买,米止得三斗,各家妻小仰给,何以充足?

乞要给发盐银,量增折放……每粮一石,再加银三钱……听其从宜余买,以舒军士目前之急,于增折色之中,而阴寓赈恤贫穷之惠。麦熟停止,后不为例。<sup>①</sup>

延绥镇由于兵荒马乱,加上春季青黄不接,米价上涨到了3钱/市斗,折合2.1钱/仓斗。虽然军士月粮折价从7钱提高到了1.1两,但只能买到约3市斗的米,不足家口食用。因此王琼要求将军士月粮折价再加3钱,提高到1.4两,并且后不为例,只是临时调整折价。但是这种临时调整折价仍要低于粮米时估,原因在于边镇灾患时期发放月粮,并非要保证一石的足额,而是“阴寓赈恤贫穷之惠”,即按照赈灾的思想,保证军士最低的食用标准。同样道理,保定巡抚苏祐言及紫荆等三关情况:“今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以来,米价腾贵,每米一斗,值银一钱五分……防守官军每名加增给银六钱五分,团操官军每名亦增给银五钱二分,领马者再加一月。时歉可少被体恤之仁,时丰不得援以为例。”<sup>②</sup>可见嘉靖二十四年内三关米价上涨到1.5钱/市斗,折合1.05钱/仓斗。苏祐援引往年事例,请求将军士月粮折粮临时提高到0.52钱/仓斗或0.65钱/仓斗,虽然仍低于粮价,但可以起到“少被体恤之仁”的赈灾效果。

嘉靖三十三年(1554),由于大同镇“数年灾歉,虏马蹂践,谷价腾贵”,宣大总督王忬提出增加军士月粮折价:

银一两止买二斗五六升,较之市斛,每石止得七斗。

臣之愚计,欲于上半年本色月米三斗之外,再加本色米三斗,又恐米之难得也。欲酌增折色之银,以斗米值银二钱伍分为率,三斗米该价七钱五分。

又恐八万八千余军,势不能以遍增也。欲将出战马军并哨守边墩夜不收等军,约计四万四千余人,照前增银,其步守杂差人役,不必概增,以滋冗费。<sup>③</sup>

大同镇粮米的价格为3.8钱/市斗~4钱/市斗,折合2.6钱/仓斗~2.8钱/仓斗,月粮折价0.6钱~0.7钱不敷食用。于是王忬提出增加本色月米,实际仍是提高发放月粮折价。值得注意的是,月粮临时调整折价是“以斗米值银二钱伍分为率”,即按照0.25钱/斗为标准,这与粮米2.6钱/仓斗~2.8钱/仓斗的时估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月粮临时调整折价仍是以仓斗为单位发放。虽然月粮折价增加到与粮价一致,但只占月粮的30%(三斗),且仅限于部分军士,其余一半的步军、杂差人等,仍维持原有0.6钱/仓斗~0.7钱/仓斗的常折价。

① [明]李承勋:《少保李康惠公奏草》卷7《延绥救荒事宜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第23b-24a页。

② [明]苏祐:《谷原疏议·巡抚疏议》卷1《乞怜边关贫军借支增添月粮急救群生以苏困苦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7-28页。

③ [明]王忬:《御史大夫思质王公奏议》卷9《条处兵马钱粮恳乞天恩大破常格速赐施行疏》,《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1册,第807页。

临时调整折价引起边镇军饷支出增加,这一部分主要由户部负担。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大同镇粮价上涨到1.67钱/市斗,宣大总督翁万达题请:“除见发六万两之外,再议发帑银二十余万,速解前来,以救目前十分之急。”<sup>①</sup>万历年间,因延绥镇“自万历十年以来,频罹旱荒,蠲免相继。中间本色粮料在各城堡,每银一钱,止买米四五升,豆七八升,多者米不过六七升,豆九升”。因此延绥巡抚梅友松题请将“十四、十五二年年例,一并预发”<sup>②</sup>。无论是多讨还是预发年例银两,都是由户部支付。因此户部和边镇督抚在调整月粮临时折价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便是量入为出。如果所有军士月粮全部按照时估折价,势必会导致入不敷出,如山西巡抚吴牲所云:“岁多凶歉,米价踊贵,每石至二两有奇,若欲照原折之例,每石六钱三分,军士必不乐;从若照市价折与,约费二十余万,金钱从何得来?”<sup>③</sup>边镇只能将月粮折价的增加,限制在一定数量范围,或者限于某些军士。

因此出于节省军饷的角度考虑,边镇月粮折价存在着有减无增的上限原则。倘若灾荒、虏患年份,粮价涌贵,高于上限,根据军士“粟贵银贱,利在得粟”<sup>④</sup>的情理,边镇会将月粮发放本色粮米,如蓟辽总督王一鹗所云:“节经诸臣建议,如遇丰年,多放折色;如遇年荒,多放本色。”<sup>⑤</sup>因此发放本色和折色之间,存在一个价格阈值,如兵部尚书李承勋云:“米价每石值银一两一二钱以下,则放折银;每石值银一两四五钱以上,则放本色。”<sup>⑥</sup>嘉靖三十三年,由于蓟州“近岁水旱频仍,斗米值银二钱之上,极为腾贵”,米价达到2钱/市斗以上,高于阈值,应发放本色月粮,故蓟辽总督杨博题请“将镇边、横岭、长谷三城下半年月粮并马匹料草早为查议,全给本色,以消隐忧,以慰疲民。”<sup>⑦</sup>具体做法为,将在仓粮米发放,而将军士月粮折价抵扣入库,待到秋成或者米价平稳之后,利用贮库折价余米还仓。宣府巡抚韩邦奇指出这样做有五点好处:“以陈朽而得新好,国储不至于有亏,一便也;军士得受其实惠而不至于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专大利而时估可平,三便也;所费之银少而得多四便也;经收人员不至衔冤负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sup>⑧</sup>可见边镇根据时节、粮价调整月粮的本、折发放,对于节省军储、实惠军士均有裨益。

倘若边仓粮储匮乏,不足以发放本色月粮,边镇设法补充粮米,方式主要有三种,如三边总制杨一清所云:“自来处置边储,不过曰空运,曰召商,曰采买三者而已。”<sup>⑨</sup>边镇在灾荒、虏患年份,粮食减产,产出有限。无论是召商还是采买,与增加月粮折价一样,反而引起边镇粮米需求增大,白银通货膨胀,导致粮价持续上涨,以至于出现“市无榷卖,(银)置之无用”<sup>⑩</sup>的恶性循环,反而事倍功半。因此从供需角度而言,边镇会更倾向于从腹里空运粮米来增加粮食的供给。

“空运”也称为“攒运”,万历《延绥镇志》解释云:“凡本边岁用不足,起借民夫、车脚,转运腹里地方粮

① [明]翁万达著,朱仲玉、吴奎信点校:《翁万达集》卷11《粮料缺乏恳乞天恩早发帑银以救目前危急疏》,第357页。

② [明]梅友松:《抚延疏稿》卷1《题为军饷万分匱急恳乞圣明俯赐通融岁额以救然眉以备不虞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四年刻本,第10b、14b页。

③ [明]吴牲著,秦晖点校:《柴庵疏集》卷14《给折存本未便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

④ 巡视辽东给事中侯先春指出:“粟贵银贱,利在得粟;粟贱银贵,利在得银,情也。”([明]侯先春:《谏草存笥》卷中《安边二十四议疏》,影印清道光活字本,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第60a页)因此明代边镇军士月粮的发放规则,也是与一年内粮价的波动相适应。一般上半年青黄不接,粟贵银贱,发放本色粮米;下半年粟贱银贵,发放折色银两。

⑤ [明]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卷3《条陈议宽工作等疏》,第4675页。

⑥ [明]李承勋:《少保李康惠公奏草》卷4《会议事件》,第18a页。

⑦ [明]杨博著,张志江点校:《杨襄毅公蓟辽奏疏》不分卷《边方寒苦议处以苏贫困疏》,《山右丛书·二编》第4册,第190页。

⑧ [明]韩邦奇著,魏冬点校:《韩邦奇集·苑洛集》卷13《议处年久浥烂预备仓粮以济时艰事》,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⑨ [明]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关中奏议》卷11《为急处边储以防虏患以安地方事》,中华书局,2001年,第406页。

⑩ [明]李承勋:《少保李康惠公奏草》卷7《延绥救荒事宜疏》,第18b-19a页。

草来边。”<sup>①</sup>即由官府组织军民夫役运输粮料。如延绥镇,正德时户部冯清将西安、延安、庆阳三府解运延绥镇的税粮折银征收。隆庆年间,因虏患、荒歉,三边总制王崇古将延安府各州县的民运税粮改征本色,加以脚价、耗米,“或官为督运,或募民转输”,至镇城、边堡各仓口交纳。如此一来,“该镇每岁得数十万之粟、豆,可免银易、招商之重价;官军得数十万之本色,免终岁采买之艰难。”<sup>②</sup>空运一定程度上可以平稳边方粮价,缓解边饷不足。相比于南方水运,北边采用牲畜陆运为主,“雇民车则必给以脚价,拨军骡则必给以行粮料草”<sup>③</sup>,运输成本往往不菲,因此王崇古只从距离最近的延安府空运粮料,而稍远的西安、庆阳税粮仍然是征银解运。最终边方本色粮米是召商采买还是空运,取决于边镇和腹里粮米差价的高低。

## 结 语

通过将九边正常年份的粮米常价,以及灾荒、虏患时期极端粮价,分别和军士月粮折价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九边粮米存在市斗和仓斗两种不同的容量单位。仓斗和市斗的比例从0.7:1到0.5:1,市斗存在不断增大的趋势。边镇在召商采买和钱粮会计时以市斗为单位,军士月粮发放和折银则以仓斗为单位。

第二,九边粮米常价选取正常年份秋冬镇城米价为代表。总体上西边高于东边,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但幅度有限,一般不超过2钱/市斗。具体而言,每当边防压力增大,粮价一般会上涨到1钱/市斗。如成化、弘治时期套虏南犯,延绥镇粮价接近1钱/市斗;嘉靖庚戌之变后,大同米价达到1.1钱/市斗;隆庆年间蓟镇战略地位上升,米价达到0.9钱/市斗;辽东米价长时期内粮米平价只有0.25钱/市斗~0.5钱/市斗,万历末萨尔浒之战后上涨到1钱/市斗以上。明代中期以来,九边从西向东,粮价逐渐突破1钱/市斗,这与北方民族迁徙、军事威胁从西向东的转移同步。

第三,边镇承平时期粮米常价与军士月粮常折价基本一致。当边方军事压力增大,粮米常价上涨,导致月粮折价低于粮米常价。具体而言,以“月粮折价/粮米常价”比值为衡量,延绥镇比值在成化时最低,后来逐渐升高到100%;大同镇从庚戌之变后比值下降,万历后逐渐升高;蓟州在隆庆时比值从100%下降到50%;辽东镇比值一般是100%,万历时开始降低。明代九边月粮折价与粮米常价比值的变化趋势,也正反映了北方军事威胁从西向东转移的过程。

第四,局部灾荒、虏患时期,粮价涌贵,边镇会临时提高月粮折价,但仍低于粮米时估。这是由于边镇月粮折价存在有减无增的上限原则,当粮米时估高于上限,边镇会转而发放本色粮米。边镇根据粮米时估调整月粮的本、折发放,有利于节省军储、实惠军士。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以延绥、大同、蓟州、辽东四镇为代表,来说明九边情况,这种举证属于不完全归纳,对于九边粮价与月粮折价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九边区域性差异的探讨,仍希冀于更多材料和例证的补充。基于以上粮价统计分析,可以为边镇粮饷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根据粮料、草束价格,便可以将边镇收入统一按照银两折算,从而量化民运、屯田等项收入占比。边镇开中盐粮,需要按照粮米时估高低,来制定斗头斤重,召商报中。在开边盐价固定的情况下,将粮米常价代入计算,便可以获知明代九边究竟开中了多少粮米。这些相关史料多记载在明代户部尚书、边镇督抚等奏议中,值得进一步发掘梳理。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万历《延绥镇志》卷2《钱粮·调度·攒运》,第167页。

② [明]王崇古著,张志江点校:《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卷11《为恪遵圣谕条陈边务以图安攘事》,《山右丛书·三编》第4册,第468页。

③ [明]杨时宁:《总督宣大山西军门奏议》卷1《为穷边困极再恳天恩减米价缓扣抵酌往例以救时艰以恤重镇事》,《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23册,第31页。